**中韩关系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努力方向**

－中国学者的视角－

毕颖达[[1]](#footnote-1)\*

摘要：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随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半岛核问题发酵以及相关国家政治变动，中韩关系正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因素的作用下，中韩关系中“求同存异”原则下原本被搁置的“异”开始浮上水面，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两国关系，更具体地体现为两国外交安保领域的分歧日益增多，经贸结构趋同引发的竞争日益激烈，认知恶化造成的相互“嫌恶感”日益上升，以及价值理念差异催生的疑虑日益加重。未来，中韩应从更长远的视角思考中韩关系，尽快恢复和增进战略互信，在此基础上冷静管控和处理好各个领域的突出问题，在密切经济利益的同时急需在安保领域做出实绩，这也是改善相互认识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韩关系、美国因素、韩半岛、相互认知

1. 主要成就

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全面发展。政治外交领域，在首脑外交为代表的高层交往频繁，确立了一系列战略、外交、安全对话沟通机制，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两国关系也由建交时的睦邻友好关系，逐步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济贸易领域，中韩关系实现了飞跃式发展，成就了国际经贸关系领域的“奇迹”。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两国的贸易往来从建交时的60亿美元迅速扩大为2018年的3100多亿美元，增长了50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积极推动区域多边合作，在FTA、RCEP等经贸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较大成绩。人文交流领域，两国间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深化。“韩流”文化深受中国民众欢迎，韩国社会中的中国文化要素也越来越丰富。特别是两国间的人员往来频繁，2014年往返于中韩之间的人员超过了1000万人次。截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平均每年有就有超过5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赴韩观光旅游，其中2016年创下了约807万人次的最高记录。不仅如此，两国互为留学生最大来源国，留学对方国家人数均保持在7万人左右，在两国关系中，知中、知华力量在逐渐壮大。此外，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也取得了明显进展，截至2021年初，两国间已经建立了660多对姊妹友好城市。军事安保领域，中韩在半岛无核化以及维护半岛和平等方面有着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这是两国军事安保合作的重要基础。两国军方已经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并建立了多个沟通与协商机制，如2011年启动的中韩国防战略对话，2015年开通国防热线等等，这样对话机制对于增进相互信任、管控半岛局势风险、推动半岛和平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中韩关系已近“而立”之年，期间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但随着两国关系深入发展，一些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些领域变得日益突出。这其中既有两国关系自身的问题，也有来自外部第三方因素干扰所产生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对中韩关系发展造成较大制约。

第一，外交安保领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取得了不少合作成果，但问题也十分突出。一是，韩美同盟关系越来越多地掣肘中韩关系发展。长期以来，韩国在外交安保政策制定及实施方面，一直坚持“立足于坚实的韩美同盟”这一基调，这导致韩国在外交安保事务的处理中不可避免地被同盟所“牵连”，有些情况下难以根据自身的意志开展自主行动。而这种情况自然会体现在中韩关系之中，无论是驻韩美军机动性调整问题，还是以萨德部署为代表的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建设问题，都明显地反映出同盟对中韩关系的制约，特别是在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背景下，这种制约正变得越来越突出，中韩关系也随着美国的这些组合动作推出而起伏波动。二是，对于如何解决韩半岛问题，中韩之间一直存在着立场差异，特别是随着韩国政府更迭，这种差异会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被突显。如：韩国保守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往往倾向于强化韩美同盟和加强韩美日三边安全协作来应对朝鲜的威胁，主张以施压制和裁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而中国则坚持强调以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赞成“体制变化”式极限制裁。韩国进步政府执政的情况下，在改善对朝关系以及解决朝核问题的思路上较为接近，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强调民族自主解决的原则，最大化地减少外部力量的介入。文在寅政府一直寻求在朝韩美三方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并建立新的半岛和平体制，而中国则倾向于四方或六方框架下解决问题。三是，两国政府间交流频繁，但并未形成与之相应的战略信任关系，体制、理念差异在两国关系的影响因素中排序呈现上升势头。特别是近年来，韩国强调“价值外交”，这使得“求同存异”原则下被搁置的一些问题跃出水面，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两国关系。正是这些立场差异，使中韩两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上难以形成深度合作，一直未能补齐两国关系中“安全短板”，进而制约着中韩战略互信的深入发展。

第二，经济合作是中韩关系的亮点，但也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一是两国贸易发展不均衡。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中韩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逆差地位，而且逆差规模持续扩大，多年连续保持在500亿美元以上，有的年份如2014年、2018年甚至达到900多亿美元。这种长期高额逆差，不利于中韩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二是对华经贸依赖度偏高引发的忧虑，正在给中韩关系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多年来，韩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居高不下，持续保持在25%左右，如果加上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部分，韩国对华经贸依赖度接近30%。高度的经贸依赖让韩国对华产生忧虑，担心中国会通过经济过多地影响韩国，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这种担忧呈现增大的迹象。近年来一些韩资企业撤离中国市场，一定程度上也是减缓这种担忧的反映。三是，产业结构趋同化引发中韩同类产品竞争加剧，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案例，给中韩经济合作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第三，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但“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明显的“质”的提升，相反，两国民众间的相互友好认知却呈现大幅下滑之势。两国建交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中韩双方往往是带着新奇、仰慕的心理看待和了解对方，以经营“新朋友”关系的姿态包容和谅解彼此，加之互补型的经贸合作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些因素推动了中韩关系迅速向前发展。在两国关系的第二个十年里，随着朝核问题的不断发酵升级，建交时期恪守的“求同存异”原则中“异”的成分不断涌现，且在紧张不断的半岛局势中被突显甚至放大，对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这种高位阶的安保领域立场差异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快会自上而下地波及到低位阶的其他领域，诱发了诸如历史、文化归属等问题领域的争议，这些争议又进一步激化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恶化相互认知。这种恶化的相互认知在外部因素影响以及媒体的炒作之下，逐步被建构为一种“固化认知模式”，而在这一“固化认知模式”下，对方的行动会变得超级敏感，往往被诠释为对立、争夺、侵占，由此，相互认知陷入了螺旋式下降轨道。特别是中韩关系进入第三个十年后，受美国战略调整、韩国对崛起中国的担忧、以及两国关系中“异”的成分不断扩大升级等因素影响，“固化认知模式”下的相互认知呈现一再下滑的势头，严重制约着两国关系发展。

困扰中韩关系的问题还有许多，这里只大体从以上三个领域进行了分析。除这些困扰中韩关系的主要问题外，在新时期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未来的中韩关系还将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的对中国战略遏制政策对中韩关系构成巨大挑战。近年来，美国为确保其霸权地位，全方位打压快速崛起的中国。为此，美国在强化对双边同盟的同时，积极推进同盟多边集团化。在东北亚地区，韩美同盟是美国重点管理的对象，希望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情况下，韩国在战略上面临如何同时处理好对美、对中关系的压力，一度寻求维持“安美经中”的状态，或以“模糊战略”在中美之间营造一种“均衡”。但随着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不断升级，韩国的既有战略越来越难以维系，“模糊战略”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目前，韩国战略界做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在战略上优先配合美国，强化同盟关系，在此基础上努力说服中国，并减少来自中国的经济损失。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文在寅政府在战略上表现出进一步倒向美国的迹象，“5.21韩美首脑联合声明”比较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其中，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表态，已经由原来的小心谨慎变为积极、明确的对接配合。很显然，这对中韩关系构成了巨大战略挑战。未来，如果韩美达成的这些战略协议付诸实践，中韩关系不可避免地再度大幅下滑，东北亚地区也恐将直面冷战式分裂、对峙的风险。

从政治外交安保层面来看，中韩关系面临的挑战最为复杂。

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影响，韩国越来越强调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对中国体制的批评之声日益增多。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尽管韩国政府没有明确表态，但从整个社会氛围来看，逐渐呈现出附和美国和西方的倾向，而这些又是中国高度敏感的问题领域。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模式”让美国和西方社会感到忧虑，担心“中国模式”会挤占“西方模式”的空间，削弱其影响力，作为西方式民主制国家的韩国自然也或多或少地怀有这样的担心。很显然，未来中国还将继续坚持自己的制度和理念，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中韩不能做到制度上“存异”，则很容易陷入制度和发展模式差异所衍生的竞争困境，它会让中韩在战略上难以走近。

在外交上也面临同样的挑战。如前所述，在拜登政府的影响下，韩国越来越公开强调“价值外交”，其后果很可能是被纳入以“民主价值”为旗号的针对中国的多边同盟集团，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外交行动会更进一步受到同盟或“价值正确”的约束，中韩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天花板”。

在安保上，中韩关系面临的挑战最为突出，也最为直接。一是美国不断向韩国施加压力，要求韩国加入围堵中国“四国安全机制+”（Quad+）。最初，韩国表达了不加入的立场，但随着美国不断对Quad进行改造升级，韩国越来越表示出加入Quad的倾向，5.21韩美首脑联合声明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许多韩国学者强调不会加入到Quad的安保合作领域，但Quad本身的指向目标是中国，且它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安保，正在变为一个关涉多个领域的复合型战略整合平台。如果韩国真的融入其中，在对华关系上将会变得更加被动，因为在Quad平台中，每个成员国都会有自己的主要角色和分工，总体目标都是指向中国。二是在配合美国进行导弹系统建设等问题上，韩国的选择非常重要。在美国不断推进在韩追加部署萨德的同时，也在寻求在韩部署中导。因这些都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敏感问题，韩国对此持非常慎重的立场，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接连不断地有“设备”被运进萨德基地，中国对此也保持高度关注。对于在韩部署中导问题，韩国非常谨慎，表现出消极的立场，但在韩美废止“导弹指南”后，中导问题如何发展倍受关注，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再次冲击中韩关系。

从经济层面来看，中韩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但也面临着高技术供应链脱节和局部领域经济脱钩的考验。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产业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中韩经济合作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涉及。特别是在美国推进对中国经济、技术脱钩的背景下，韩国也在尝试做出调整，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配合美国重构屏蔽中国的高技术供应链条，在提高对外投资和技术输出监管力度的同时，把一些投资企业转出中国。这其中固然有企业利润和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度等方面的考虑，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对中国经济脱钩基调的影响。尽管学者们都在强调“经济完全脱钩不现实”，但“尽可能”的脱钩也足以对相关国家关系，特别是对中韩关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它会进一步损害两国的战略信任，割裂合作与联系。

此外，两国民众相互友好认知不断下滑，这在未来短时期内恐将难以得到根本扭转，如果管控不当，很可能会进一步制约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有效调节和引导民众认知，为中韩关系良性发展打造坚实的民意基础，成为中韩两国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

**三、中韩的努力方向**

如前所述，中韩建交30年里，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存在许多困难，并且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未来的中韩关系还将遭遇来自多个领域的挑战。因此，而立之年的中韩关系若要取得可持续良性发展，就需要两国立足于和平与发展这一共同的大前提，努力克服困难并有效化解当面的各种挑战。

首先，在认识层面上，中韩应进一步扩大战略共识，立足于和平与发展这一前提来思考、推进两国关系。我们应认清美国的当前的政策本质，它并不真正指向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也不是在为本地区盟友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继续确保其霸权地位，其政策正在割裂东北亚地区的联系纽带，让地区国家关系走向分裂。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国际关系学者张蕴岭教授指出，中韩应从大视野下看待两国关系，并努力跳出西方的国际关系思维范式，活用东亚人固有的“和”文化基因，构建一种基于新时代、新文明的中韩关系。

其次，在战略层面上，中韩两国应明晰共同的战略需求，利用好战略合作空间，共同防止新冷战格局出现。半岛本就没有终结冷战结构，在美国冷战式对华遏制政策之下，这一残留下来的冷战结构有再度复活的风险。一旦新冷战格局形成，这对中韩以及本地区国家来说都将是巨大灾难，因此应全力阻止。为此，中国应努力避免走上与美国强硬对立甚至冲突的道路，而韩国应努力为缓解中美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应注意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框架。

再次，在实践层面上，中韩应畅通渠道，做好更深层次的战略沟通，并明了底线，确保合作利益。在发展良性的经济合作的同时，努力在安全议题领域创出实际业绩，以补齐“安保短板”，增进相互信任。疫情过后，在尽快恢复人员交流往来的基础上，拓展和深化人文交流维度，努力提升交流的质量，逐步地增进相互认知的好感度。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要正确引导媒体报导，努力做到客观、正确报导对方，避免“歪曲、丑化”的螺旋升级。

 **参考资料：**

1、张蕴岭：“大视野下的中韩关系”，2021年10月16日，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中韩关系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2、趙立新：“中韓關係能否迎來‘第二個春天’？”，《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3、毕颖达：“朝鮮半島新形勢下深化中韓安全合作的思考”，《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10期；

4、이민규:“한중 국교정상화 30년의 성과와 과제: 한국의 관점에서,” 2021년3월31일에 경남대학교 극동문제연구소에서 주최한 “한중관계학술회의”의 발표 논문.

**作者主要经历**

现任：

2011.2-现在，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教授

兼任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历任：

2018.6－2020.11，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

2017.12－2021.10，中国亚太学会东北亚研究会秘书长

**近期代表性成果：**

 1、張蘊嶺、畢穎達 主编：《東北亞地區關係概覽》，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

 2、“20世紀70年代初駐韓美軍减撤與韓國‘自救’政策探析”，《史學集刊》2019年第6期

3、“朝鮮半島新形勢下深化中韓安全合作的思考”，《現代國際關係》2019年第10期

4、“調整中的美韓同盟:發展歷程、强化動因及其挑戰”，《美國研究》2018年第1期

5、“朝核危機‘常態化’下的朝韓關係困境與出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第3期；

1. \* 毕颖达，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 [↑](#footnote-ref-1)